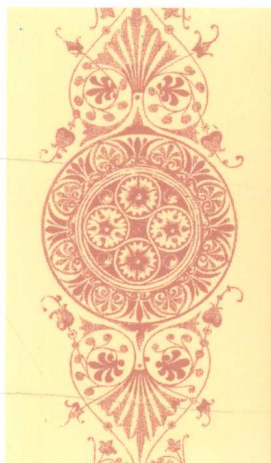


7

世界文明史研究丛书



王云龙 陈界 胡鹏 著

福利国家： 欧洲再现代化的经历与经验

Fuli Guojia:

Ouzhou Zai Xiandaihua De Jingli Yu Jingya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7 世界文明史研究丛书

F u l i G u o j i a :

O u z h o u Z a i X i a n d a i h u a D e J i n g l i Y u J i n g y a n

福利国家： 欧洲再现代化的经历与经验

王云龙 陈 界 胡 鹏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利国家:欧洲再现代化的经历与经验/王云龙,陈界,胡鹏
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301-17539-2

I. ①福… II. ①王… ②陈… ③胡… III. ①福利国家-福利制度-研究-欧洲 IV. ①D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8687 号

书 名:福利国家:欧洲再现代化的经历与经验

著作责任者:王云龙 陈 界 胡 鹏 著

责任编辑:闵艳芸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7539-2/K·0704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824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minyanyun@163.com

印 刷 者: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965 毫米×1300 毫米 16 开本 14.75 印张 211 千字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目 录

导 论 福利国家:再现代化的历史实践	(1)
一、福利国家:从社会战争到社会和谐的路径选择	(2)
二、福利国家:社会民主主义实践的历史载体	(6)
三、福利国家:经济社会发达的必经阶段	(12)
四、援助导向保障:福利国家社会建设的轴心	(15)
五、《贝弗里奇报告》的历史影响	(19)
第一章 福利国家:原发现代化的否定之否定	(21)
一、阶级斗争:社会资源单向流动的经济现代化 困局	(22)
二、民主运动:民族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政治现代化 进程	(30)
三、非理性主义:人性异化的文化现代化反诘	(37)
第二章 “国家社会主义”:福利国家的发轫	(44)
一、俾斯麦社会立法的历史背景	(45)
二、俾斯麦社会立法的内容及特点	(57)
三、俾斯麦社会立法的历史地位	(65)
第三章 德国福利国家的历史与现状	(68)
一、早期实践:魏玛共和国时期福利国家建设	(69)
二、全面实践:二战后福利国家建设	(78)

三、危机与破解: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福利国家建设 …	(91)
四、德国社会福利制度现状	(98)
第四章 法国福利国家的经历	(113)
一、“国家保障”:再现代化的冲动	(113)
二、萌芽时期:二战前福利制度建设	(119)
三、战后福利国家建设	(123)
四、法国福利国家现状	(132)
第五章 北欧福利国家的经历与启示	(147)
一、丹 麦	(149)
二、瑞 典	(161)
三、挪 威	(176)
四、芬 兰	(187)
五、冰 岛	(195)
第六章 福利国家的历史经验与历史方位	(205)
一、福利国家的历史经验	(205)
二、福利国家的历史方位	(216)
参考文献	(227)
后 记	(231)

导 论

福利国家:再现代化的 历史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国家在社会民主主义倡导的福利国家的基础上,进行了战后重建与复兴的再现代化。现代化是前福利国家的历史阶段,再现代化是福利国家建构与完善的历史进程。西欧国家战后的再现代化,与战前的现代化的质的区别,就在于这是以全面社会建设为内涵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性实践。以福利国家为载体的西欧再现代化,在社会财富分配领域,突出强调社会化、民主化的配置性机制,改变政府“守夜人”的消极角色设定,而更具公共保障性职能。在西方的学术语境中,福利国家与欧洲发达国家是同义语,这表明,福利国家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一、福利国家：从社会战争到 社会和谐的路径选择

近代以来,由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思想革命(启蒙运动)开启的囊括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全方位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它导致了世界历史的形成。世界现代化进程历时性地体现为世界历史,在发生学意义上,它以工业革命为物化形态,以资产阶级为人格担当,以资本主义为社会平台。这是因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①。工业革命造就了资产阶级统治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大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②。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③。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什么别的联系了”^④。

在工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尖锐对立与激烈斗争,“产业革命到处都促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同样的速度发展起来。资产阶级愈发财,无产者的人数也就愈众多。因为只有资本才能使无产者找到工作,而资本也只有在使用劳动的时候才能增殖,所以无产阶级的增长是和资本的增长完全一致的。同时,产业革命使资产者和无产者都集中在最有利于发展工业的大城市里,广大群众聚集在一个地方,就使无产者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后来,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随着挤掉手工劳动的新机器的不断发明,大工业就把工资愈压愈低,把它降低到上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② 同上书,第113—114页。

③ 同上书,第255页。

④ 同上书,第275页。

的那种最低额,因而无产阶级的处境也就愈来愈不堪忍受了。这样……产业革命便孕育着一个由无产阶级来进行的社会革命”^①。工业革命带来了财富的剧增,1801—1850年,英国国民收入增长125.6%,1851—1901年又增长213.9%。但是,贫富差距与财富增长同比拉大。1801年,占英国总人口比例仅1.1%的最富有的人占有国民总收入的25%。1848年,1.2%的最富有的人占有国民总收入的40%。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例由1803年的42%降至1867年的39%。时任英国保守党领袖的迪斯雷利承认:“英国可以分为两个民族——穷人和富人,他们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一位当时的社会学家评价英国工业革命的心脏城市——曼彻斯特时说:“世界上没有其他哪座城市,其贫富悬殊是如此之大,贫富之间的鸿沟是如此难以逾越。”^②在工业革命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受自由主义支配,又被称为“自由资本主义”,这种“自由主义的重点集中于市民个体追求和维护其自身利益的权利。……自由主义宪政的本质是对个体自由与权利的保障,并将此作为对政府权力和其他个体的基本限制”^③。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马尔萨斯等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学说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自由竞争、生存竞争、优胜劣汰、优富劣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金科玉律,是至高无上的市场法则,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掷骰子的结果。由此导致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尖锐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分裂,出现了西方学者借用古罗马的事件术语所表述的“社会战争”^④。针对愈演愈烈的“社会战争”,先后出现了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民主主义三种基本解决方案,尽管取向各异,但都致力于从社会战争状态导向社会和谐。早在英国刚开始进行“羊吃人”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圈地运动”时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便于1516年出版了《乌托邦》,表达了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5—216页。

② 钱乘旦等:《现代化的迷途》,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页。

③ S. Miller, *Mastering Modern Europe History*, Macmillan 1997, p. 52.

④ R. Loveridge ed. *Human Relation*, Sage Publications 2000, p. 13. 社会战争(Social War):公元前90—89年,意大利中部与南部的罗马盟友要求获得罗马公民权,遭到罗马当局拒绝,公元前90年,发动反对罗马的战争,初获大胜。仅一年后,公元前89年,被罗马军队击败。

社会和谐的真挚向往与热忱期盼。从此,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和谐构想与践行史不绝书。19世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威尔士工厂主罗伯特·欧文把自己创办的工农业公社,径自命名为“新和谐”。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兴起,空想社会主义归于落寞,但空想社会主义秉持的社会和谐理念,在西欧分别被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民主主义发展,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机地交融,形成了以“福利国家”构建为内涵的再现代化。

资产阶级为了缓解“社会战争”造成的紧张局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收效不甚明显。以英国为例,1601年通过了第一部“济贫法”,19世纪上半叶,又通过了新“济贫法”。新法渗透了自由资本主义的价值取向,对于受助对象规定了极为苛刻的条件,而且在社会上营造了受助于“济贫法”者是人生的失败者的氛围。贫困的普遍化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痼疾,1901年,在“日不落帝国”首都伦敦31%的人口处于贫困。1899—1902年的英布战争,暴露了贫困对英国国民素质的戕害。征兵总监的报告中指出,在报名服役的人员中,只有五分之二的人能在部队中服役完两年。在1899年10月到1900年7月,曼彻斯特地区有11000人报名服役,发现其中有8000人扛不了枪,受不了严格的军队生活,在其余的3000人中,只有1200人在肌肉发育和内脏功能方面适合军队的要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根据英国政府对250万人的检查,其中每三个人中只有一人完全适合服役条件。“社会战争”直接影响了大英帝国的赫赫国威。资本主义头号强国——英国尚且如此,严酷的现实促使西欧社会有识之士开始探寻从社会战争走向社会和谐之路。其破解之道,就是构建福利国家。

词源学上,“福利国家”一词,出现于1941年,英国主教特珀尔用“战争国家”(warfare state)一词称呼法西斯德国,用“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来称呼与法西斯主义暴政浴血奋战的西方民主国家。语义学上,“福利国家”一词的现代用法是与英国在1948年实行全面的社会保险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英国这一制度的建立依据1942年威廉·贝弗里奇发表的《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的报告(也称为《贝弗里奇报告》)。“在20世纪,先前消极、自由放任的国家

逐渐转变,转而寻求提供与福利国家相近的基本社会保障。”^①英国人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为国王和帝国而战,而是为了全体英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民福祉而战。^②1941年6月,以保守党人丘吉尔为首相的英国战时内阁,成立以威廉·贝弗里奇为主席的战后重建与社会保险委员会。1942年11月,威廉·贝弗里奇发表《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的报告(即《贝弗里奇报告》),提出社会保障计划应包括三种社会保障方式: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自愿保险。社会保险满足居民的基本要求;社会救济满足特殊情况的需要;自愿保险则满足收入较多的居民较高的要求。报告提出了社会保险的基本准则:所有家庭不管其收入与支出水平如何,应当一律按照统一标准上缴捐款和领取津贴;领取津贴的数额与时间应当充分;范围应当全面广泛;行政管理应当实现统一;社会保险应当按照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社会方式进行调整。^③

《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的基本思想是,社会保障以保证居民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为限。报告指出,“社会保险旨在维持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收入”^④,进而强调,“社会保障就是对收入达到最低标准的保障”,“国家所组织的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的目的在于保证以劳动为条件获得维持生存的基本收入”,至于有些阶层要求保障超出最低生活标准的需要,那可以通过参加私人举办的自愿保险计划去解决。社会保障应当体现“普遍和全面”的原则,即应当包括所有居民的各种不同社会保障方面的需要^⑤。

《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特别指出:“(社会保障)计划不是一个毫无交换条件和随随便便地给人提供好处的计划,也不是一个以劳动和捐款为条件,保障人们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收入,以便使他们可以劳动和继续保持劳动能力的计划。”^⑥报告指出,社会保障计

①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93, vol. 12, p. 569.

② P. Addison, *The Road to 1945*, London 1977, p. 131.

③ 参见 W. Beveridge, *Social Insurance and Allied Service*, London 1942, pp. 121-122.

④ *Ibid.*, p. 14.

⑤ 参见 *Ibid.*, pp. 120-121.

⑥ *Ibid.*, p. 170.

划旨在直接解决贫困、疾病、愚昧、肮脏和懒惰等“五大弊病”。社会保障计划只不过是向“五大弊病”发动攻击的“社会总计划的一部分”^①。

《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成为战后工党政府构建福利国家的立法与施政的理论依据。在战争结束后的三年中,英国工党政府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通过了一系列社会保障立法。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保险法》(1946)、《国民卫生保健服务法》(1946)、《家庭补助法》(1945)、《国民保险(工业受伤)法》(1946)、《国民救济法》(1948)等。这几项立法,加上其他有关措施和法令,构成了构建战后英国福利国家的法律体系与制度安排。

二、福利国家:社会民主主义实践的历史载体

社会民主主义“是这样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主张通过和平的、体制内的政治进程,促进资本主义转化为社会主义。在依据 19 世纪社会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具有共同的意识形态来源,但剔除了激进主义和集权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最初是作为修正主义出现的,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了修正,放弃用革命的手段建立社会主义社会”^②。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以建立惠及全体人民的福利国家为政党的执政理念,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符合欧洲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不容忽视的重大历史现象,尤其是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更是不能回避,且有必要深入地研究与探讨。

19 世纪后半期,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祖国——德国,经济飞速发展。1870—1913 年,从普法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工业生产递增 4.5 倍,生铁由 139 万吨增至 1 933 万吨。1913 年,德国钢铁产量超过英法两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之和。1870 年,德国在世界工业总产量的比重居第三位;1913 年则居第二位,欧洲第一位。与此同时,德国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壮大,工人运动兴起并得到

① W. Beveridge, *Social Insurance and Allied Service*, London 1942, p. 170.

②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93, vol. 10, p. 920.

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指导与具体帮助。1875年5月,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1890年改称德国社会民主党,希特勒执政后被取缔,1945年恢复,是社会党国际的主要成员党,在德国政坛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亦是社会民主党人)。德国尽管是一个容克资产阶级国家,但为了支撑经济跨越式发展,缓和阶级矛盾,形成军国主义的举国体制,德国政府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主持下,通过了一系列劳动社会保障立法。1881年颁布《大保险法》,对工人实行全面的社会保护。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全民社会保障的国家。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发展迅猛,成立一年后,党员人数近四万。1877年,党拥有41种报纸,14个印刷所;同年,国会选举,获50万张选票,12名党员当选为国会议员。尽管1878年10月,俾斯麦颁布了针对该党的《非常法》,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运动取得一系列合法斗争的成就,工人生活得到改善和提高,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地位逐步上升。1880年大选,该党获55万张选票,在国会中占有24个议席。1890年,获142万张选票,占35个席位,成为国会大党之一。英、法等西欧国家的社会党人在议会斗争中也取得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相同的成功。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民主党成为西欧国家议会大党,甚至组阁已经屡见不鲜了。西欧进行1848年式革命或“巴黎公社”式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了。恩格斯在晚年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创新勇气,坚持与时俱进,针对变化了的西欧社会形势,及时为工人运动指明了新的前进方向。恩格斯在1895年3月指出:“历史证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

1848 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①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发展是工人运动前进的导向,时代精神的火炬在垂暮之年的恩格斯手中高擎着,放射出与时俱进的永恒光芒。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斗争的成功范例,是恩格斯用来阐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内涵的具有说服力的论据。恩格斯指出:“德国工人除了单以自己作为一个最强有力、最有纪律并且最迅速增长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了这头一个贡献以外,还对它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他们就一直使用选举权,以致使他们自己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并成了世界各国工人效法的模范。如果用法国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话来说,选举权已经被他们——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的工具。”^②恩格斯对于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西欧工人运动出现的新情况、新形势,作出了新的判断,指出激烈的冲突形式的阶级斗争已不再是主要的无产阶级斗争方式,议会斗争等合法斗争手段更加有利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 1848 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街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③。恩格斯从工人阶级作为起义者方面,具体地剖析了在西欧起义形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时的原因,指出:“在起义者方面,一切条件都变坏了。人民各阶层都表同情的起义,恐怕不会再有了;在阶级斗争中,中等阶层大概永远不会这样毫无例外地通通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致使那纠集在资产阶级周围的反动党派几乎完全消失。这样,‘人民’将总是分裂的,……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

①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7、9 页。

② 同上书,第 13—14 页。

③ 同上书,第 14—15 页。

少数人带领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①恩格斯揭示出合法斗争对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巨大意义:“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方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那些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却在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弄得无法生存。……只要我们不糊涂到任凭这些党派把我们骗入巷战,……现在遵守法律是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有利的。”^②

社会民主主义是19世纪普世性的先进理念,以社会绝大多数底层工人群众的利益为关注焦点,天然地具有人民性。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语义与当代语境有着明显的义理时差,自19世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至俄国1917年革命与第三国际产生前,社会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内涵,以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流派的社会主义。这一原初语义持续到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此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语境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一术语被用来指称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理念,同共产主义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无关了。

与第三国际共产主义理念相对立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修正主义形态,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治理论家伯恩施坦等建构的。伯恩施坦在1899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注定灭亡的基本理论观点提出异议。他指出,资本主义正在克服自身的许多缺点,如失业、生产过剩、财富积聚、两极分化等。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社会民主主义代表了按照既有的现行政治的合法程序,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渐进的转型的政治理念。它与共产国际倡导的在资本主义落后地区武装夺取政权,用无产阶级专政方式,跨越资本主义阶段,推进社会主义取向的现代化方式的理念针锋相对。社会民主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它不可能在前资

^①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第17—18页。

^② 同上书,第19、21、22页。

本主义地区发生。马克思、恩格斯祖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本国的政治实践出发,修改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说,主张放弃以革命的方式建立社会主义,转而采用议会斗争的合法渠道取得政权。“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兴起与奥古斯都·倍倍尔的努力分不开……社会民主党在德国的成功,促进了社会民主主义向欧洲其他国家的传播。”^①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倍倍尔认为,社会主义应该能够通过合法而非暴力的手段来建立。1912年,该党在德国国会中成为第一大党,在全部397席中占有110席。通过社会民主党的努力和德国资产阶级的妥协让步,德国工人阶级享受着当时全欧洲最好的社会福利待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就,促进了社会民主主义在全欧洲的传播。进入20世纪,不仅德国社会民主党,西欧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把构建福利国家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载体,进而把福利国家等同于社会主义。1940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硝烟中,英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工党自信地宣布:社会主义的英国不是乌托邦,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目标。^②

在现实语境中,社会民主主义居于当下普世性思潮位势结构的中间立场,区别于右翼的自由主义,也区别于左翼的共产主义。无论左、中、右,都是现代性社会思潮,差别在于理论的前提与关注点的不同。右翼自由主义认为,现代性社会是建立于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宗教和意识形态自由、追求个人幸福自由的大社会、小政府的基础上的;社会民主主义认为,这些自由权利只从法理上保证了资源与机会分配程序上的公开、公平与公正,这些权利的行使必然要产生一个超越任何利益集团之上的国家权力,来维护一个公正的社会的日常运作,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其他形态的第三部门、法人、自然人无法起到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在强调国家政权的作用方面,社会民主主义接近于共产党人,但在国家政权合法性来源、程序性授权方式与程序化运作方式方面,与共产主义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维护个人自由方面,社会民主主义接近于自由主义,

①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93, vol. 10, p. 920.

② 参见 P. Adelman, *The Rise of Labour Party*, London 1977, p. 79.

但与自由主义倡导的消极自由——不损害他者同样的自由,有着取向上的区别,社会民主主义倡导积极自由,运用国家权力去增进与完善个人的自由存在状态。西方政治学家文森特指出:“从1920年以后到如今,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术语一直与相关的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传统有着最为牢固的联系。”^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战争的废墟上,面对战后复兴的历史重任,通过民主选举的合法途径,西欧国家社会民主党相继执政。这些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施政中,坚持五点原则,即政治自由主义、混合经济、福利国家、凯恩斯经济学、平等信念,^②其核心是构建福利国家。例如英国在1945年夏季战后第一次大选中,立刻把工党选上台,毫不留情地抛弃了领导英国赢得战争胜利的保守党。选民把选票投给了社会民主主义及其政党,也就是投给了福利国家。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逐渐抛弃了党章中有关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学说的规定,反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主张积极地进行和平演变,在武装“冷战”的同时,进行意识形态的“热战”,通过福利国家的构建效应,来树立自己的话语霸权与伦理权威。在国内政策上,社会民主党放弃暴力和革命学说,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对一切形式的专制集权主义,抛弃马克思关于民主是资产阶级统治人民的伪装的观点,宣布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规定性。社会民主党主张国家积极支持经济增长,而非实现经济国有化。客观地看,社会民主党实行“从摇篮到墓地”的福利国家制度,从另一条途径接近了经典作家预言的“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其他一切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前提与结果”的理想社会。在二战之后相当长的时期,西欧不仅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奉行建设福利国家的政策,而且包括保守的资产阶级右翼政党在内的几乎所有政党无一例外地秉持福利国家的政治理念,也就是说,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欧、北美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在当代语境中,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直遵循着线性的现代化模式——也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

① Vincent, *Modern Political Ideologies*, London, 1995, p. 222.

② 参见威·佩特森等:《西欧社会民主党》,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福利国家是一个长期的公民权演进过程所达到的最高峰”^①。福利国家是社会民主主义在战后西欧复兴的历史性实践,其意义是常思常新的。

三、福利国家:经济社会发达的必经阶段

福利国家是战后西欧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是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新的质的规定性的体现,构建福利国家的过程也就是再现代化的进程。这一进程的意识形态特质,就是社会民主主义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在福利国家的平台上,“以国家规制而非国家所有的方式,促进经济更有效率地增长,收入分配更加公平”^②,实现了超越工业革命的再现代化。战后西欧的再现代化,在生产力要素结构和生产关系构成两方面有机互动地实现了社会化整合,实现了社会结构中产阶级化,社会发展后现代化:在社会生产力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性发展,由工业经济迈向知识经济,由发达的现代化进入到更加发达的后现代化,社会生产力的主导产业形态由工业经济转变为知识经济。号称“福利国家”的发达国家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80%,世界贸易总额的75%,并占据世界几乎全部的资本输出。发达国家生产力要素结构发生质的变化,生产工具的中枢由机械控制转为智能控制,生产方式由标准化、大批量、固定性转为个性化、小批量、随机性。人的体力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被降至最低限度,人的脑力劳动部分地被人工智能设备所取代,智能化是知识经济的主体性特质。

劳动对象全方位拓展,生产活动的空间拓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人类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第一次翱翔外层空间,60年代后期,第一次登陆月球,人类终于步出了自己的地球摇篮。同时,人类不再单纯地依赖煤炭、石油等一次性非再生资源,转而综合利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子能、太阳能、风能、地热资源、海洋资源,合成了大量人工材料。人类的生产性活动不再仅仅局限在陆地,

① 安·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②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993, vol. 10, p. 920.